



#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南京大屠杀 > 论文

## 口述史学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发布时间: 2006-11-29    点击次数: 1113    作者: 朱成山 袁志秀

摘要: 口述史学作为日益时兴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 具有独特的特征, 对拓展和加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上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成果, 且有进一步应用的前景和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 口述史学; 南京大屠杀史; 研究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作为一种方法, 中国古已有之, 如司马迁的《史记》便是久负盛名的“口述史学”著作, 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对口述史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早, 目前在口述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较完备的首推美国。但是, 近年来, 国内口述史学的研究和应用也日益深入和广泛, 其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的成功应用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本文旨在分析口述史学的特征, 阐述其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并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学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梳理, 试图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一些可行性预测。

近年来, 在调查幸存受害者, 记录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见证, 进而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过程中, 十分注意运用了口述史学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口述史学? 中外专家学者对口述史学的界定不尽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罗纳德·格里教授说: “口述史学是亲眼看到并参加在过去事件中的采访, 目的是要重现历史, 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瞩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 川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他的口述史学专著《从事口述史学》中有一段论述: “简单地说, 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 (2) 也有论者认为: “口述史学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 然后整理成文字稿, 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3) 由此可见, 口述史学即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 同时也可作为历史的分支学科。

那么, 为什么要应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呢? 因为, 口述史学对历史科学的最大贡献, 就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它的出现, 丰富了历史编撰的形式, 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口述史学之所以能够对历史研究有所贡献, 能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这是与口述史学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的。其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民主性。在研究对象上，口述史学一反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研究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方法。这一特点在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研究中得以体现，在那场劫难中的受害者、幸存者及目击者等普通老百姓，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通过记录他们的亲身经历所获得的口述史料，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2. 合作性。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口述史学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受访者既是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史学研究的主体。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的过程中，他们常常由于悲愤而泣不成声，有时甚至难以继续回忆等多种情况，这就需要采访者提前做好情感疏导准备，并且在采访过程中不断加以引导和劝慰。所以，这种口述史料的获得，不是历史工作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历史见证者和历史工作者共同合作的“公共产品。”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我们必须谨记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joint product)。(4)

3. 动态性。口述历史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语境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背离的，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具有滞后和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时，留在人们记忆中是血腥的屠杀，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记忆是深刻的，铭心刻骨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存活下来的人当年是幼年或不更世事，而在调查访问时，他们都年事已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随着生活阅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这种特点，需要访谈者之间反复交流、沟通，有时甚至需要启发、引导历史见证人，帮助他们恢复记忆。此外，对获得的口述史料，还需要进行比较、筛选和甄别，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释疑解惑的目的。

4. 跨学科性。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几乎包涵了全部的社会科学。在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应综合应用历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多门学科。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必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客观真实地投射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单一的史学研究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 二

从上述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方法，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功用，因而引起了许多领域历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历史研究过程中。它对于开拓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新方法，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引用口述史学方法，可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找到新的视角。口述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的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般而言，传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视角：一是主要从集中运用文字资料收集和史料考证角度，很少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元素，这就使得研究视角狭窄，缺乏立体化审视；二是更多的注重宏观方面的研究，而微观研究显得较薄弱。口述史学的应用，可以大大拓展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视阈，因为，一方面，它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的各种方法，使得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趋向立体化；另一方面，其他历史研究的分枝学科，都没有像口述史学那样突出个案研究的地位，并特别强调微观研究的应用，把它应用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上，则弥补了以往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不足的缺憾。此外，伴随着现代高科技录音技术的使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有声研究。

其次，引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抢救性调查与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人，年事已高，并终将一一逝去。如果不抓紧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口碑资料，势必会给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留下永久缺憾。如1984年调查发现了1756位幸存受害者，但到1991年调查时发现，已去世300多人。1997年，虽然对南京市进行了地毯式的大范围普查，也只发现了1213名仍然在世。近年来，李秀英、潘开明、刘永兴、陈德贵、伍长德、唐顺山、彭玉珍、罗谨、吴旋等一批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幸存受害者，都离开了人世。所以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抢救历史的活证据，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做点扎

实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的日益提高而升级的录音技术，高质量地记录下幸存受害者们真实地历史记忆和见证，使他们对这段血腥历史的控诉之声，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但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口述史料搜集工作，尚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科学和高质量地体系。

再次，援引口述史学获得地口述史料，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文字记载不完整地缺陷。历史上有很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完整地文字记录。但事后人们又必须了解它的历史真相，补救的办法只有对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凭证。口述史学正好提供了进入这些领域的机会。如在二战中，日本实行战时新闻管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言论钳制之严，日本人民当时是不容易知道这种南京大屠杀惊人暴行的。据前坂俊之根据《出版警察报》的统计，有关南京大屠杀被禁止刊登的文章，1938年1月为25件，2月为109件，3月为48件。记者们不仅不能如实报道日军的暴行，还得唯心地歌颂它的“仁慈功德”，粉饰南京的“太平景象”。由于缺乏完整且有说服力地当时文字记载，这些被粉饰地虚假历史，事隔几十年后，被日本右翼势力当做“真相”传播与放大，留下了极为恶劣地负面影响。驳斥谎言和歪曲历史地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调查与收集南京大屠杀证人的口述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后，引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口述史料，可互为印证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真实性。迄今为止，学界已经有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加害者、第三国证人等不同层面的口述史料，它们和一些相继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中外文字记载资料和文物相互印证，验证了历史的真实性。例如：我们调查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在当时留守南京的第三国证人的日记书信及拍摄的照片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证人李秀英的证言：1937年12月19日，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我在南京安全区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内避难，为了反抗三个日本兵的强暴，我的脸上、腿上、和腹部被日本兵戳了三十多刀，嘴唇、弃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父亲把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5)诸多的中外证人均可以为李秀英作证，无论是美国人约翰·马吉、罗伯特·威尔逊还是德国人约翰·拉贝等当时留守南京的第三国证人，均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李秀英的受害经过。当时鼓楼医院的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到：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姑娘，企图反抗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有很深的一个刀口，今晨在医院里我听不到胎音，她很有可能会流产。……(6)此外还有中国的证人——当年鼓楼医院的护士沈文俊也能够为李秀英作证：李秀英的父亲找人把她抬进鼓楼医院时，李秀英的脸上有多处刀伤，衣服上全是血，当时她还有身孕，第二天早我接班时，她已经流产了。她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7)等等。这些证据共同印证了侵华日军当年对李秀英的施暴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说李秀英是假证人等的荒谬言论。所以，通过引用口述史学方法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口述史料，进一步证实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和不可否定性。在日本某些政要和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和抹杀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复杂背景下，口述史学方法应用所带来的贡献，无疑是对这一逆流进行强有力回击的利器。

### 三

从1984年第一次大范围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收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口述史料，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纵观这一历程，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其应用由稚嫩走向成熟，推动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果颇丰。梳理一下口述史学在南京大屠杀史上的应用特点及产生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重点放在南京乃至国内的调查，使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搜集的范围和力度逐步加大。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市教育局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单位，先后在1984年3-9月、1991年9月和1997年8-9月，曾经分别组织过以南京市为重点的大规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的普查、复查和口述史料征集工作。1984年3月至8月，经过6个多月的普查，在南京六个城区、四个郊区，共发现幸存受害者有1756人，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史料，并在此调查基础上，从幸存受害者的证言证词中，选择了642份，整理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1991年夏，在1984年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复查，发现已有300人去世，在寻访的过程中，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共同制作了电视教学录像带一《300000的控

诉》，后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中小学辅助教材。1997年8-9月，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委再度联手，共发动14700多名大、中学生，并邀请日本全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组织24名日本的大、中学生参加，举办“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活动。通过对全南京市15个区(县)50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作地毯式的调查，共发现2460多份线索，再经过核对，共发现1213名仍然健在的幸存受害者。在调查过程中，南京市、区(县)16个司法公证处全程参与，并对其中1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分别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35名幸存受害者的证言资料，进行了现场摄像公证，使调查的证言、证据，更具有法律效力，为历史留下了永久的铁证。值得欣慰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幸存受害者的调查登记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昌、九江、武汉、合肥、杭州、常州、镇江等全国各地，调查和搜集许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证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又陆续搜集到300多份新的幸存受害者证言资料，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该馆收集整理、编纂、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与此同时，其他单位小规模的各种调查也在继续进行。例如，南京理工大学8名青年志愿者在2002年暑期访问了近140位老人，取得了100多份证词，收集到数十名遇难者的名单，发现了一批新的南京大屠杀人证和物证。此外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也曾进行了一些调查。

2. 下气力拓展搜集的渠道，在海外广泛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料。目前，在台湾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还有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仍然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通过多种渠道，如委托海外热心人士代为征集和派专人到海外征集以及通过因特网等方式，收集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口述证言。新发现的幸存者有美国的章楚业、台湾的胡伟、新西兰奥克兰的李道火奎先生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陆安莉女士等。同时，对加害国日本方面的加害口述史料也展开了调查。近年来，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日本教师松冈环女士，她费劲周折，克服种种困难，调查了150多位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证言，并整理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加害国口述资料。她本人因此在2005年，获得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当然，在日本还有许多和松冈女士一样有良知的人，坚持南京大屠杀加害口述史的调查，并整理集结出版。如日本原《朝日新闻》的记者本多胜一，某化工厂工人小野贤二，以及原《赤旗报》记者下里正树等，都进行过这方面的调查。在2005年12月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作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和口述史料”的演讲。这个演讲是以他即将出版的《二十七位体验者讲述南京事件：大屠杀时期及其之后的人生》一书为内容的。这本书是他在采访调查二十七位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及其相关者的基础上成书的。

3. 充分利用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影视等艺术作品。在广泛征集和调查的基础上，有关方面注意整理并出版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作品，为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智力支持。在这些作品中，除上文提到的外，主要有：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金陵血证》、《金陵血泪》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孙宅巍、李德英著《黑色12·13—南京大屠杀最新揭秘》、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徐志耕主编《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和《屠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杨新华主编《血证》；日本女教师松冈环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出版的专著《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等。此外，还利用这方面的口述史料制作了一些影视作品，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1987年)、《屠城血证》(1987年)、《1937：南京真相》(2005年)；南京电视台摄制的《历史的见证》(1995年)8集纪实片；江苏电视台摄制的纪实录相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1997年)上、下集电视片；中国国家舞剧团推出的舞剧《南京1937》(2005年)等。

毋庸讳言，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因此，将它运用于南京大屠杀研究也会由其局限性。特别是幸存受害者记忆的可靠性问题，即口述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值得注意。南京大屠杀历史幸存受害者的口述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之上，由于时间的久远，或幸存者年龄增长而逐步形成的记忆力减退等因素，对自己亲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记忆可能有些混乱或偏差，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口述史学的研

究方法时，必须把获得的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与其他文字和实物史料结合起来相互比较，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正如杨雁斌所说：“口述史料必须同文字资料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8)

对于上述这些，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今后口述史学视阈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空间的开拓大有可为：一是广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传媒，尽快尽可能搜集更多的幸存受害者，并获得他们的口述史料；二是利用当前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口述史料进行整理，用先进的录音设备录音，创造良好的幸存受害者口述历史史实的情境；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所获得的口述史料的利用，不仅用中文，还可考虑用英文、日文等其他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让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四是在口述史料和其他史料的基础上，由现象描述走向深入的理性分析和总结，并着手进行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价值判断，进一步提升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水平。

注：

(1)(2)(4) 转引自：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页、第5页、第26页。

(3)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5)(7) 朱成山：《慢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357—35页、第567页。

(6) 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8) 杨雁斌：《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特点》，《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 朱成山：《为30万冤魂呐喊》（上、下），新华出版社，2001年。

(3)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4) 荣维木：《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江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 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北大史学》，1993年第1期。

(6) 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3期。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 2006年第4期 编辑：王丽娜）